

# 前言

本書旨在分析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熟悉卻又缺少研究的課題，即1949年以前國民政府對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的政策，特別是其對西藏問題的處理。在中國近代史上，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的民族政治(ethnopolitics)常受限於某些刻板印象，大都未經實際考察與嚴謹材料的證明。這也可以理解，因為過去學者們較難接觸並利用到那些揭示漢民族主義者與其少數民族關係和少數民族領土問題的原始材料。近年，由於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的漢文檔案材料，特別是蔣介石個人資料的解密，各地學者可以更好地探究民族政治這一迄今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充滿挑戰的問題及其直接背景。筆者的研究就得益於對這些新出漢文檔案材料的利用。

本書圍繞西藏議題(Tibetan agenda)展開研究，這個議題很好地揭示了近代中國對內部與外部主權的追求。自1912年清朝覆滅，這個重要而複雜的問題隨即與新生的中華民國政治體制緊扣起來，1928年以後又成為定都南京以後的國民政府整體政策制定下的一環。本書重新評價國民政府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當局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本書還揭示了在近代中國內憂外患與政局紊亂的時期內，中國的領土目標是如何從傳統的帝國秩序朝向近代政體轉變，而這個過程有時是以意外與偶然的方式呈現出來的。

本書第一、第二章提供1920年代末與1930年初中國政治與領土

局勢的背景知識，以及1928年後國民政府官僚體制中有關中國邊疆問題的決策結構，這兩章描述在國民政府統治的早期階段，「中華民國」的本質是甚麼，以及如何在這個更廣闊的歷史與政治制度背景下，理解國民政府的邊疆議題。1928年以後，國府中央設立了蒙藏委員會來處理邊疆議題，這個機構向來被視為一個冷衙門，然而本書會揭示，與傳統的認識恰好相反，蒙藏委員會並非國府中一個無關緊要的微末機構。這個機構給國民政府的中央官員與邊疆諸省份當局提供了一個平台，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與邊疆少數民族事務實際上不相關的其他政治議題。除了蒙藏委員會，國民政府的外交部與軍事部門也在國府時期的民族政治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早期，南京的國民黨與處於自治狀態的邊疆省份當局，皆有技巧地利用複雜甚至危急的邊疆局勢，達致各自的目的。舉例而言，國民政府經常透過操縱邊疆與民族政治議題，來進行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與政權鞏固 (regime-consolidation)，逐步把政治影響力延伸至邊疆省份。此外，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以後，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雖成為全中國的政治中心，實際上卻不過是一個地區政權，致力於打造一個體現「五族」（漢、滿、蒙、藏、回）共和的國家形象。儘管隨之而來的內戰嚴重打擊了國民黨人所亟欲宣傳與建立的國家形象，蔣介石仍然成功地讓遠在邊陲的少數民族相信，他這個新的南京政府比過去的軍閥政權具備更有利的條件，可以解決當時困難重重的邊疆問題。

第二部分的三個章節討論戰前十年 (1928–1937) 國民政府的西藏問題。以往有關漢藏關係史的著作普遍認為，自1928年以後，國民政府即反覆重申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由於國民黨人標榜着致力於推動國家統一、反帝國主義、提倡民族尊嚴與民族拯救，並促進五族共和，要是說他們也沒那麼渴望回到自己宣稱擁有全部主權的西藏，可能會有點誇張。然而，這些章節的研究顯示，在統治的初期階段，國民政府是否真的在意西藏應該無條件、絕對地成為中國

版圖完整的一部分，仍有待進一步探討。換句話說，當面臨內部政治分裂與外部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虎視眈眈等危機，國民黨人是否真的擔憂失去西藏，甚或其他邊疆民族地區，不無疑問。誠然，1930年代的國民政府要員，無人敢說南京當局實力太弱，因而無法實施強有效的邊疆政策；也無人敢提出放棄五族共和，或者對邊疆地區形同虛設的權威。但是，我們必須重新考量，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虛幻圖騰背後，許多當時所謂的「邊疆政策」有多少是純粹為了解決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有多少是醉翁之意，另有政治動機？有鑒於此，本書第二部分特意以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的內部整合與國家建構，以及中央政府在戰前十年鞏固權力的過程為背景，對20世紀前半期中國歷史上的邊疆與少數民族議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本書第三部分的三個章節討論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的西藏議題。已有研究著作認為，日本侵華以及抗戰時期中幾個大國出現並與中國結盟，給國民黨人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他們可以推進對邊疆地區的主權聲明以及恢復中國的昔日榮耀。珍珠港事件之後，漢藏關係的確發生了急劇改變。當中國成為「四強」之一，國民黨人即開始談論恢復對邊疆地區的主權問題。這些著作還認為，在1940年代初，蔣介石甚至一度考慮準備利用軍事手段徹底地解決西藏問題。事實上，戰時國民黨對西南邊疆的權力推進的嘗試，是基於對自身政權安危存亡的現實考量，這些考量比源自孫中山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籠統的意識形態，更為緊要與迫切。

換言之，二戰期間中國對西藏的所謂「積極政策」(positive policy)，不過是戰時重慶為維繫政權生存而不得不採取的選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對西藏問題的立場極為務實。我們從表面(以往的著作與政治上的宣傳話語即基於此)獲得的印象，與戰時國民政府官員實際如何看待邊疆議題並付諸實施之間，存在着鴻溝與落差。從一個較長時段的歷史角度來看，1937至1945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意外地給戰時西南的國民政府提供了一個契機，使得他們可以

在西南地區恢復自1911至1912年清帝國秩序瓦解後，便被中斷的中央在邊陲地區的國家建構。第三部分提出的新的闡釋，正是通過將漢藏關係放在南亞與內亞國際戰爭的背景之下作仔細研究，從而更好地理解1930和1940年代中國的邊疆與少數民族議題，以及當今中國的領土主權輪廓是如何在二戰時期被建構出來並最終成形。

本書最後兩章立足於戰後漢族與少數民族衝突的廣闊歷史背景之下，探究戰後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的邊疆局勢。由於國共內戰，1945至1949年的歷史常被描述為某種過渡階段，但這樣的描述忽略了一些富有意味且重要的課題。其中一個被忽視的話題，便是國民政府如何在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群體衝突的歷史背景下，重新規劃邊疆決策。這些章節顯示，戰後國民政府的邊疆議題由那些威脅到「中國」這個概念本身的確切含義，以及形成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事件所決定。這些章節還揭示，國民黨在擊敗日本並把國都遷回中國內地之後，如何費力地試圖維繫中央政府在各邊疆地區的權威與影響力。戰後國民黨加強對邊疆地區影響的意圖，正好增加了各個非漢族民族群體的民族主義意識。同時因為二戰後新的政治風潮，以及國共內戰，各少數民族勢力向國民政府索取更多政治權利與經濟資源的訴求越來越強烈，戰後中國的西藏問題也將放在這個歷史背景下進行檢視。

儘管只有短短四年，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的最後階段卻非常關鍵，至少在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上如是。在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外熱議的爭端話題，諸如西藏問題、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與半個世紀以前國民黨遺留下來的領土與少數民族歷史遺緒密不可分。因此從這個較少人切入的角度對邊疆議題做的考察，是本書的價值所在，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持續存在的問題的歷史根源。